

◀（上接 14 版）

系无任何一句直接的史料关联，作者却通过丝丝入扣的分析，以大量翔实而准确的旁证建构起完整的史实证据链，充分展示了田余庆先生敏锐的洞察力、天才的想象力和缜密的表述力，文章如老吏断狱，令人拍案击节。

经过几代前辈学者的探索和耕耘，中古研究已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中最具学术底蕴的领域之一。新时期的中古史研究，兴旺中蕴含着隐忧，成果积累丰厚，研究起点高，是学科发展的优势所在，但史料稀缺，选题难觅，也成为后继学人的共同困惑，充分借鉴前辈学者对于旁证研究的经验与手段，提出新的假说，或许可成为新时期中古史研究深化的途径之一。以北魏前期的国史之狱为例，前辈学者如陈寅恪、周一良、牟润孙等多有发明，分别从胡汉纷争、佛道之争，太武帝与景穆太子的矛盾等角度进行过深入探讨，几近题无剩义，而青年学者仇鹿鸣近年发表《高允与崔浩之死臆测——兼及对北魏前期政治史研究方法的一些反思》（《社会科学战线》2013 年第 3 期）一文，则另辟蹊径，从分析高允与崔浩之间的私人关系入手，并对高允在崔浩之死中的作用提出新的假说。作者注意到，高允是继崔



建鼓乐舞

滕州市汉画像石馆藏

画面中央树一建鼓，二小鼓，二人边击边跳，左有抚琴、倒立、掷丸者；左上有七首神兽、猫头鹰；右一树上有羽人饲凤，树旁一人及羽人格斗、猴子、祥禽。四周双边框内填刻斜线纹。

资料图片

浩之后北魏政权中汉族士人的代表人物，两人曾共事近二十年。从表面上看两人之间关系密切，世代交好，但崔浩为了保证其姻亲家族的利益，多次阻碍高允及其家族的仕途，高允早期的仕宦经历与鲜卑贵戚关系密切。两人在表面上关系密切，背后却蕴藏种种芥蒂，高允在这一时期政治上的其他活动基本上都是处于崔浩的对立面，而真正与其过往甚密的政治人物又几乎都是崔浩的政敌，这不得不使人对崔浩与高允关系之真相产生怀疑。作者

又根据高允受命草诏夷崔浩五族，并在崔浩死后受敕收浩家等史事，提出高允乃是崔浩之死事件关键人物这一假说。尽管高允与崔浩的直接关系尚缺乏直接的史证，但“其实无论高允是否与崔浩之死有关，都无可否认他是崔浩死后政治上最大的受益者，高允借此取代了崔浩的地位，成为北魏政权中汉人大族的代表人物。”作者清醒地意识到，“受制于史料的不足，对此问题只能提供大胆的假设，但在小心求证的道路上却是困

难重重，难成定讞。笔者所试图提供的是一种理解崔浩之死这一复杂谜案的新进路，即不再将崔浩为首的汉人士族视为一个毫无区分的整体。”论文对旁证的分寸感把握得当，虽然通篇并未对高允与崔浩关系提出任何一条“新证”，但“文中所提出的高允与崔浩之间关系的几个疑点，皆有坚实的证据可供依凭。”“如果我们稍稍偏离胡汉对立的传统叙事，注意到汉族士人、鲜卑贵戚内部复杂的分合关系，或可为观察北魏前期政治史

提供一些新的维度。”

无论是汉魏南北朝史还是隋唐史等断代史研究，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摸索和积累，旁证的使用已经成为一个较为成熟并行之有效的研究手段，进而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扩大中古史研究的史料视野？中古史研究旁证引用是否存在“边界”？除了同时代的横向史料，纵向相隔较远的其他断代的史料，特别是后世的史料能不能作为前代问题佐证？在我个人近期的研究中，曾经遇到这样一个问题：汉魏南北朝史传中经常出现所谓“圜圜空”的记述，成为一种程式化书写屡屡见诸史传。如东汉童恢为不其令，“一境清静，牢狱连年无囚”；韦义为广都长，甘陵、陈二县令，“政甚有绩，官曹无事，牢狱空虚”；北齐宋世良为清河太守“天保初，大赦，清河狱内蓬蒿但满，无囚可赦，惟遣将拜诏而已”；隋刘旷为平乡令，“狱中无系囚，争讼绝息，圜圜尽皆生草，庭可张罗。”这类记述的思想渊源是古人以所谓“仓廩实而圜圜空”（《管子·五辅》）作为理想社会的重要表征，汉代以后独尊儒术，“民亡盗贼”、“圜圜空虚”亦成为时人描述政治清明、社会安定的习用语。汉代以来，史传中关于地方官吏政绩的表述中，地方案件稀少，监狱囚犯人数少甚至连年无囚，圜圜空

（下转 16 版）➡

◀（上接 14 版）

制造作为对象吧。传统的史料学，与颠覆性的后现代史学思潮一拍即合，中古史界顿掀起一场局部风暴。愚以为，苟能扎实汲取史料学、文献学、版本学、修辞学的养分，厚积薄发，这场“哥白尼式革命”在几十年后，定能建起宏伟大厦，但若急功近利，强行突破，“为赋新词强说愁”，则恐不免走火入魔之弊。在新式史学道路上比中国先行一代人时间的日本学界，即使在人心浮动的泡沫经济时代，历史书写的议题也未须臾形成潮流，今日更显冷清，这是否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？

第二类史料中，很多利用门槛较高：缺乏一定的地理知识，不能深入理解《水经注》；无足够的佛学储备，要将《高僧传》《弘明集》流畅读完，都属难事。会上，方圆博士的《南朝佛教仪式疏文得名源流考》，陈志远

博士的《六朝的转经与梵呗》，都是利用此类史料做的专门研究。我对佛教文献有过持续的浅接触，《金刚》《法华》等六朝译经均颇熟悉，也读过汤用彤先生的《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》，佛教的理论框架、宗派流变，自信能说出大概，但听方、陈二位的解说，依然时不时“掉线”，难于紧贴语境。越专业，越艰深，越寂寞，投稿却越难被期刊采用，这是研究者的困境。相比之下，史学界的主流，还是更倾向于以二类史料作为一类史料的补充，寻找其中包含的政治、制度、人事、社会等信息。陈爽老师的《〈世说敬胤注〉所见东晋佚史考》，即是秉持这一主流思路而作的报告。在南京本地小规模青年读书会上，我们曾从《弘明集》所收梁武帝及群臣批判范缜《神灭论》的文字中，爬梳萧梁前期的种种官名，拿来和《宋书》《南齐书》的《百官志》对照，澄清了一些疑点。另外像《搜神记》《高僧传》所收人、地、官名，《水经注》《颜氏家

训》记载的事件，均能补充第一类史料的不足。

由于很多文献本身的整理度或普及度不够，利用传统视角采掘第二类史料，空间仍很广阔。如对散佚在后世文献里的中古地书方志，清人王谟和今人刘纬毅先生都有专门的辑佚，2012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推出了辑注顾野王《舆地志》的作品，但在对逐条佚文归属的判定上，均多少存在推敲的余地。再以《水经注》为例，晚明以来，它的文本一直在持续整理当中，仅区分哪些是经哪些是注，哪些是郦道元的注中之注，就花费了几个世纪，但即便杨守敬、熊会贞师徒已集明清之大成，已故的段熙仲、陈桥驿先生又投入半生心血，这部书的文本问题依然未全解决。今天，日本中古史学界仍在细读《水经注》。应窪添庆文教授的召集，十多位东京学者组织了《水经注》研究会，每两周在东洋文库聚会半日，分头研读。他们的前期成果已集结付梓为《水

经注疏译注·渭水篇》和《洛水伊水篇》两种，厚厚的三册，但对包含 137 条河流的《水经》和涉及 1200 多条水道的郦注而言，这仅是一个开始。类似规模和定力的读书班，在国内未曾听说，这样的话，我们要补的课怕还很多。基于第二类史料的研究，还有多远的前路可走？感觉一眼看不到底。

第三类史料，是近二十年来最受关注的。就出土资料的体量而言，中古的简牍不比秦汉，铭碑墓志不及隋唐，但对于力量本就相对单弱的中古史学界而言，这些新材料堪称极大丰富，甚至是无底洞：从形式、体例到内容，可以研究的东西太多。罗新、叶炜两位老师合作的《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》几乎是当今同行学人架上必备的参考书，会上叶炜老师报告的《从不书志主名字现象看中古墓志集本与石本的异同先后》，则系着眼于中古墓志的书写体例与制作程序。邓玮光对走马楼吴简的

文本复原有过很深的思考，这次发表的《许迪案小考》则走出简牍本身，将其中记载的小事件同孙吴政权的大历史紧密联系在了一起；陆帅的《萧梁前期的北来降人：新刊梁〈普通二年墓志〉小考》，从一方文字严重重漫残缺的南朝墓志入手，讨论了萧梁前期的政治局面和社会人群问题。

用来与一类史料相参证的三类史料，无论有字的碑碣简牍，还是无字的遗址器物，都可发挥作用。结合汉魏洛阳城遗址中的官城考古成果和正史记载，陈苏镇向我们详细介绍了中古官城的一般结构。中古宫殿的内部形态，不仅与历次官闾政变有关，更牵涉到中央权力的日常空间运作，如能澄清，意义重大。然而，累见于史书的殿、省、阁、门之名，读来总让人如堕云雾。基于正史文献，祝总斌《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》对东晋南朝台省方位有过考证，陈苏镇 1993 年

（下转 16 版）➡